

## “政治语言学研究”专栏

## 主持人语

刘宏

语言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在语言学研究领域被广泛认同,并得到深入研究。这不仅催生了政治语言学这一分支学科的诞生,而且也成为批评话语分析及语用的跨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实际上,政治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联姻。后来成为批评话语分析领军者之一的英国语言学家奇尔顿(P. Chilton)与俄国政治语言学家伊林(M. Ilyin)等在1998年编辑出版的《1989-1991 欧洲转型时期的政治话语》一书便是例证。这也说明政治语言学和批评话语分析在关心国际政治热点问题上的高度一致。为了延续这一传统,本专栏刊出的五篇论文围绕不同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运用语言学及话语分析的方法展开研究。孙玉华、刘宏、彭文钊的论文通过分析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底发表的国情咨文,发现“克里米亚”作为语言意识形象的内容,在国家领袖的政治话语中被重塑为多样的、团结一致的俄罗斯民族以及中央集权制俄罗斯国家形成的精神起源地。冉永平、杨娜的文章结合突发事件的危机语境特殊性,考察了新闻发言人话语中言据性的认知立场和语言特征,以达到缓和冲突的目的。黄敏的文章对中国近代更具广泛代表性的社会理想进行话语分析,探讨其与当今“中国梦”的关联,发现当今“中国梦”与近代社会理想既有联系也有区别。柴红梅的文章通过分析安西冬卫的诗作,考察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的时空叙事,揭示被掩盖和遗忘的日本现代主义诗歌发生史的真相。刘风光等的论文通过分析中美政治道歉的言外之力明示手段和政治道歉策略的选用,揭示中美政治道歉言语行为的异同,并揭示产生差异的社会文化深层次原因。

这五篇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治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的多样性,以及在研究方法上的跨学科性。在跨学科研究对语言学领域的创新发展具有引领和示范效应的社会科学研究背景下,我们期待更多的跨学科研究成果问世。

## “克里米亚”作为语言意识形象的 政治语言学研究\*

——以普京国情咨文文本为例

孙玉华 刘宏 彭文钊

(大连外国语大学俄语学院 辽宁大连 116044)

**摘要:** 语言意识形象是心理语言学和语言文化学等学科关注的跨学科问题。随着政治语言学的兴

\* 基金项目: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创新团队项目“东北亚地区比较文化研究”(项目编号: WT20130009)、辽宁省“东北亚外交外事协同创新中心”(辽教发[2014]130号)和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第二批“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研究”(项目编号: 15ZDB092)的子课题“东正教与俄罗斯民族语言”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孙玉华,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俄语教学法、俄罗斯文学; 刘宏,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语言文化学、跨文化交际与俄语教学、政治语言学; 彭文钊,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俄语语言文化学。通讯作者邮箱: lhl-hf0140@163.com

起,政治文本与民族语言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俄语语言意识形态“克里米亚”历经历史上的三个发展阶段后获得新的内涵。我们通过对俄罗斯总统普京2014年底发表国情咨文的研究证明:国家领袖的政治话语重新塑造了“克里米亚”作为语言意识形态的内容,克里米亚成为多样的、团结一致的俄罗斯民族及中央集权制俄罗斯国家形成的精神起源地。国情咨文中定义的“克里米亚”语言意识形态将影响俄罗斯人对“克里米亚”的认知。当代俄罗斯政治文本影响民族语言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化,政治文本与语言意识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共变关系。

关键词: 政治语言学; 政治文本; 语言意识形态; 克里米亚

DOI:10.13458/j.cnki.flatt.004305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038(2016)06-0001-11

## 1. 引言

把语言的作用引入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始于建构主义。“规则建构主义不但对语言转向后的建构主义理论本身进行了发展和完善,而且把他们应用到国际关系的具体案例分析之中,展开了深入的经验性和概念性研究,显示出语言建构主义的巨大活力”(孙吉胜,2007:40)。近年来在语言学与政治学的边缘兴起的政治语言学是语言建构主义的发展和写照。政治语言学是建立在语言学和政治学交叉点上的一门语言学分支学科,它主要运用语言学和政治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研究语言与政治的共变关系问题,通过政治交际研究作为言语活动的政治话语,研究通过语言运用获得政治权利与意识形态操控的规律与策略。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是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基本单位(孙玉华、彭文钊、刘宏,2015:2)。俄罗斯学者А. П. Чудинов指出,政治语言学完全具有现代语言学的多学科性、人类中心主义、扩张性、功能性和阐释性等特点(丘季诺夫,2012:1)。近年国际政治舞台的中心问题之一是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克里米亚半岛地处黑海北部中央,东部是俄罗斯,西临欧洲大陆,北接乌克兰,南与土耳其黑海相望,战略位置险要,自古以来就是欧亚大陆濒临黑海各国相互争夺之地。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国际社会围绕俄罗斯重新拥有对克里米亚的主权反应各异,以美国为首西方阵营对俄罗斯实施了高压制裁,其他各阵营国家委婉表达各自的立场和观点。本文尝试从政治语言学、语言文化学和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研究政治文本对语言意识的影响。我们认为,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具有建构功能,能够在特定的环境下形成、影响和塑造民族语言意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4年底的国情咨文中,通过一系列政治话语重新塑造了“克里米亚”(Крым)作为语言意识形态的内容。当代俄罗斯政治文本影响民族语言意识形态的发展和变化,政治文本与语言意识存在相互影响的共变关系。

## 2. 语言意识形态的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语言意识(язык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问题是当代语言学内各分支学科普遍关注的问题。对语言意识的研究始于俄罗斯莫斯科民族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有А. А. Леонтьев、А. А. Залевская、Н. В. Уфимцева、Т. Н. Ушакова及Е. Ф. Тарасов等。其中Е. Ф. Тарасов认为,跨文化交际是语言意识分析的本体,语言意识是指借助于词、自由词组、固定词组、句子、篇章及联想场等语言手段而得到外化的意识形象的总和(Тарасов,2000:26)。这里的语言意识形象(образы языкового сознания)指的是语言个性为保持自己的精神存在而形成的关于现实世



界客体的感性知识和观念知识的总和(Тарасов, 1996: 41)。E. Ф. Тарасов认为,要在跨文化交际中达到相互理解,交际双方需要具有所使用语言的共同知识和以意识形象形式存在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共同知识。只有两个跨文化交际者具有的意识形象具有共性时,跨文化交际才能取得成功。语言意识形象是研究语言意识的基本单位(Тарасов, 1996: 41 - 42),是主体对外界观察和感知所获得的知识在意识中的系统反映,这些知识会在人所认知的事物、人的行为和人的言语中得到外化表达。我们认为,语言意识形象是民族认知库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具有民族性特征,最典型的外化表达形式是词汇,文学文本和政治文本等都是建构语言意识形象的基本单位。语言意识形象的形成是民族文化动态发展的结果,是民族文化观念域的构成单位。

我们认为,语言意识形象同样存在于政治话语和政治文本之中,并通过政治话语和政治文本得到外化表达,是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对象物。“政治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与政治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相关。政治语言学建立在人类中心论基础之上,以语言世界观及语言世界图景作为理论基础,这意味着政治语言学视野下的语言与政治研究具有以意义为核心的本体论性质、以语言世界观和语言世界图景为基础的认识论性质和以对话性为基础的方法论性质”(孙玉华 彭文钊 刘宏 2015: 5)。研究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中的语言意识形象,就是在民族语言世界图景框架下对民族认知内容的追溯。作为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中的语言意识形象必须具备以下三方面的要素,一是属于民族文化本源体系,二是在言语交际中成为常规型形象,三是与具有典型民族文化特点的丰富联想密切相联。反映和揭示以上三方面要素的语言意识形象分析是语言意识形象政治语言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语言意识形象分析方法同样离不开文本分析、文化观念分析、话语分析等具体研究方法。同时,对语言意识形象在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中的功能分析有助于理解政治文本的意义传达。我们认为,语言意识形象在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中具有以下几个功能:一是反映功能,指在政治语言形式和意义中反映人对现实的想象,包括对语言自身的想象和认识;二是评价功能,即通过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在标准、修辞、美学、民族和社会等各层面进行评价;三是目标选择功能,是在政治情境中选择语言手段和在言语结构中确定意思时的趋向感;四是阐释功能,即对政治文本符号的性质进行说明。在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中,语言意识形象的评价功能和阐释功能占主导地位,赋予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深厚的民族文化背景及与之相关的联想域。交际者在政治文本及政治话语中通过使用语言意识形象达到政治交际的目的,同时政治文本和政治话语成为语言意识形象内涵发生变化的媒介和途径,是语言载体认知世界和建构语言意识形象的源泉,因此政治话语与语言意识形象之间形成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共变关系。

### 3. 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的历史源流与现代认知: 镜像与映射

普京在2014年底向俄联邦会议报告的国情咨文中,用大量篇幅从国家与民族统一、民族文化统一的角度阐释了克里米亚对俄罗斯国家的重要性。国情咨文中普京总统鲜明地提出“克里米亚”是“多样的团结一致的俄罗斯民族及中央集权制俄罗斯国家形成的精神起源地”(“духовный исто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ноголиккой, но монолитной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 и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我们认为,作为政治文本的国情咨文参与了俄语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Крым”)的重塑,该重塑是以对语言意识形象“Крым”的传统认识为基础的。俄罗斯人语言意识中的意识形象“Крым”在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与宗教、历史和文化三方面内容密切相关。

首先,从宗教角度看,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内容的形成伴随着俄罗斯东正教在克里米亚的兴起。东正教在克里米亚的形成与发展始于拜占庭帝国时期,这一时期基督教传播形成了克里米亚的东正教传统。普京总统国情咨文中涉及的内容主要来源正是基于该时期的历史事实。中世纪早期拜占庭的塔夫利达(Таврида)在克里米亚北部地区东正教的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公元851年,圣徒基里尔(Кирилл)在去往哈扎利亚(即今天的“克里米亚”,作者注)途中为研究扎哈利亚语言,在赫尔松内(Херсонес)停留了半年。正是在这里圣徒基里尔第一次见到译成古斯拉夫语的《福音书》及一些教堂经文。988年圣徒弗拉基米尔大公在赫尔松内接受东正教洗礼并带动整个罗斯民众接受东正教。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评价道“通过皈依东正教的做法,基辅罗斯决定了此后几个世纪中俄罗斯的未来”(布罗代尔,2014:545)。在《文明史》中,布罗代尔对罗斯受洗有详细记载“弗拉基米尔想一度为他和他的臣民选定犹太教,但后来被拜占庭礼仪之美迷住了。988年前后,他带领他的所有臣民正式皈依基督教:基辅人民在第聂伯河河水中接受了洗礼。但是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借助于一场普遍运动,该新兴的宗教特别在南方和基辅本身传播开来。这场运动是随着861年圣瓦西里在哈扎利亚(即今天的克里米亚,译者注)具有决定意义的布道,862年摩拉维亚人的皈依,864年保加利亚人的皈依,879年塞尔维亚人的皈依……而发生的”(布罗代尔,2014:546)。罗斯受洗后克里米亚与整个罗斯一样经历了宗教混合期。这一时期的鲜明特征是东正教与多神教同时并存。14世纪鞑靼蒙古入侵克里米亚半岛建立金帐汗国兀鲁思直至18世纪中叶,克里米亚的主要居民鞑靼人信仰伊斯兰教,东正教逐渐衰落并受到排挤。18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动夺取克里米亚的战争,1784年起克里米亚半岛成为新俄罗斯塔夫利达州的组成部分,半岛迎来东正教复兴与兴盛时期。苏联时代的无神论使克里米亚半岛的东正教传统受到极大压制。1944年苏联当局对克里米亚信仰伊斯兰教的鞑靼人进行了集体迁移,但根据1939年克里米亚半岛人口普查数据,当时原来信仰东正教的俄罗斯人占半岛总人数几乎一半(刘显忠,2014:95)。20世纪末期苏联解体后东正教传统在克里米亚重新历经复兴时期。与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有关的内容在反映东正教发展历史的宗教书籍中有大量记载,具体内容与地名、人名和事件密切相关,地名有“希腊”(Греция)、“哈扎利亚”(Хазарские земли)、“塔夫利达”(Таврида)和“赫尔松内”(Херсонес)等,人名主要包括“圣徒基里尔”(Кирилл)、“圣徒弗拉基米尔大公”(Князь Владимир)等,主要历史事件有“圣徒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Крещение Князя Владимира)、“罗斯受洗”(Крещение Руси)及“东正教被排挤与复兴”(вытеснение и возрождение Православия)等。

其次,从历史角度看,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内容的形成与俄国争取黑海出海口的国家战略密切相关。克里米亚半岛在历史上历经了漫长而复杂的归属过程,与彼得一世开展改革、俄罗斯努力构建属于欧洲文明的国家进程密切相关。早在公元前,克里米亚半岛就曾经

出现过国家组织。公元 11 世纪末期,半岛上曾经生活着西徐亚人、哥特人、佩齐涅格人、希腊人和斯拉夫人等族群。1427 年鞑靼人在克里米亚建立汗国,并于 15 世纪末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听命于土耳其苏丹。15 - 18 世纪,克里米亚汗国经常骚扰和袭击罗斯、乌克兰和波兰立陶宛地区。俄国、波兰立陶宛王国及东欧国家与克里米亚汗国进行了无休止的战争。1686 年,俄国加入反土神圣同盟,并在 1687 年和 1689 年对克里米亚汗国进行过两次不成功的讨伐。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之交,俄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南部土地,取得亚速海和黑海出海口。彼得一世在位期间,建立强大的海军是使俄罗斯振兴与繁荣的重要改革措施之一,因此取得黑海和波罗的海出海口成为俄罗斯重要的国家战略之一。彼得一世在位期间俄罗斯试图取得黑海出海口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直至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期间,俄国才实现了获得黑海出海口的战略目标。1768 年 10 月俄土战争中,俄国取得胜利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出海口,克里米亚汗国脱离奥斯曼帝国而独立。1776 年秋,苏沃洛夫率军进入克里米亚半岛。1783 年俄国采用和平手段,彻底解决几个世纪以来未能解决的克里米亚半岛问题,把克里米亚纳入俄国版图,最后一个克里米亚汗王沙金·格莱宣布退位并向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效忠。1783 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国内外官员及英、法、奥等各国使节共计三千多人陪同下开始实现南巡。南巡前在波将金公爵的领导下,在俄罗斯南部包括克里米亚兴建了许多城市和居民点,兴建农村,吸引农民定居下来,以塞瓦斯托波尔( Севастополь) 为依托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黑海舰队,完成了彼得一世未尽的事业。叶卡捷琳娜二世通过南巡向欧洲各国展示了俄国的实力,改变了长期以来俄国被欧洲各国视为野蛮落后国家的固有观念。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等南方领土以后迅速成为粮食出口国,通过“新俄罗斯规划”实现国家的发展强大(杨正 2015:73)。俄国在 1853 - 1856 年与英、法、土耳其等国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至 1871 年前丧失保有军械库和舰队的资格,1871 年俄国单方面恢复在黑海拥有军舰的权利。由此可以看出,克里米亚半岛在 17 - 19 世纪俄国争取国家出海口和建设强大帝国过程中所承载的历史使命。与此条脉络相连的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多反映在历史书籍文本中,同样与地名、人名和历史事件密切相关,主要包括地名“塔夫利达”( Таврида)、 “塞瓦斯托波尔”( Севастополь) 人名主要有“彼得一世”( Петр I)、 “叶卡捷琳娜二世”( Екатерина II)、 “波将金”( князь Григорий Потемкин) 等,历史事件主要有“夺取黑海出海口”( взятие Черного моря)、 “建立黑海舰队”( создание чер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 “叶卡捷琳娜二世南巡”(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Екатерины II по югу России)、 “克里米亚战争”( Крымская война) 等。除此以外,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包含以下五对相互对立的文化观念: 1) 战争与和平( война-мир); 2) 欧洲国家与俄罗斯、沙皇( европейские страны-Россия, царь)、欧洲人与俄罗斯人( европейцы-русские); 3) 战士与敌人( воин-враг); 4) 俄罗斯人与土耳其人( русские-турки); 5) 俄罗斯人与克里米亚鞑靼人( русские-крымские татары)。同时在以上五对彼此互为对立的文化观念中伴随以“信仰”( вера)、 “道路”( дороги) 和“团结”( ополчение) 的文化观念。由这条脉络我们可以看出,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与“国家”、“战争”的观念密切相连,反映了俄国在争取自身国家认同的过程中,克里米亚半岛承载的重要历史使命。

第三,从文化角度看,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内容的形成伴随俄罗斯文化名人与克里

米亚的互动。克里米亚半岛成为俄罗斯领土之后开始吸引俄罗斯作家及艺术家探索这块异域性质的神奇土地,并在俄罗斯文学和文化中形成了“克里米亚文本”(крымский текст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该术语体现了描写克里米亚的作家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与克里米亚本土神话及文化编码之间的联系。克里米亚神奇的自然风光、丰富的历史经历及归属俄罗斯后的重建是俄罗斯文学及艺术领域的三大主题。克里米亚是俄罗斯地缘诗学的重要交汇点。克里米亚浪漫旖旎的自然风光、生动新鲜的自然生态及和谐悠远的地域特征在历史上不断吸引作家和艺术家的创作目光。一般认为,克里米亚文本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著名诗人普希金(А. С. Пушкин)的南部流放生活与创作开启了辉煌的克里米亚文本的前奏。1820年,普希金被调到南方任职,实质上的流放生活让诗人的足迹遍布克里米亚半岛,诗人先后访问了辛姆菲罗波尔(Симферополь)、费奥多西亚(Феодосия)、刻赤(Керчь)、古尔祖夫(Гурзуф)及巴赫奇萨莱(Бахчисарай)等城市。克里米亚海滨异域风格的景致和气息激发了诗人浪漫的激情与灵感,大海奔放自由的天性与诗人追求和向往的奔放豪情完美结合,其中诗歌《Погасло дневное светило》(《黑夜降临》)最有代表性。被克里米亚汗国古老宫殿的神秘传说所吸引,诗人写下了叙事长诗《巴赫奇萨莱的喷泉》,反映出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不同宗教和文化背景下的爱情碰撞及性格迥异的东西方女性形象(崔璐 2014: 12)。长诗《巴赫奇萨莱的喷泉》成为克里米亚文本的开端。普希金创作叙述长诗《巴赫奇萨莱的喷泉》的史实在苏联时期对鞑靼因素的清洗过程中起到正面作用,古老的巴赫奇萨莱鞑靼宫殿因此未被拆毁而得以完整保存,诗人的创作反过来影响了克里米亚文化基因的完整保留。继普希金之后,有多位俄罗斯作家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创作了与克里米亚主题有关的作品,俄罗斯文学界对А. С. Грибоедов, Н. В. Гоголь, Н. А. Некрасов, Л. Н. Толстой, А. П. Чехов, А. И. Куприн, И. А. Бунин等经典作家创作中的克里米亚元素进行了较为系统研究。对于许多作家来说,克里米亚不仅是异域风情的代名词,更是人间天堂的所在地。这里有旖旎的亚热带风光,更有适合恢复健康所需的气候与自然条件。果戈理(Н. В. Гоголь)1835年曾有机会来到萨克疗养区休养。在中篇小说《Тарас Бульба》中果戈理描写了15世纪处于蒙古鞑靼金帐汗国统治下的克里米亚,作家逝世前克里米亚还是其幻想再次进行治疗的圣地,直至1852年作家逝世时终因没有筹措到经费而遗憾放弃治疗计划。同样把克里米亚作为恢复健康的人间天堂的还有公民诗人涅克拉索夫(Н. А. Некрасов)。诗人在这里不仅创作了诗歌《Утомонись моя муза задорная》(《安静吧,我充满激情的缪斯》),同时还完成了长诗《Кому на Руси жить хорошо》(《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的全部写作任务。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ой)在所有作家中的经历最为特殊,从事创作后不久作家加入军队并赴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服役。当时正值奥斯曼帝国、英国和法国先后向沙俄宣战,争夺黑海及巴尔干半岛地区控制权成为战争的目的,史称“克里米亚战争”。托尔斯泰于1854年11月达到塞瓦斯托波尔。10个月服役期间年轻的作家经历血与死的洗礼,亲眼目睹了俄罗斯军官和士兵的英勇与善战。虽然俄国输掉了本次战争,但托尔斯泰在克里米亚的经历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战争结束后作家很快在《现代人》杂志上发表了由三个故事构成的《塞瓦斯托波尔故事集》。作家在该作品中描写了俄罗斯人民在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中的英勇斗争,以令人惊异的力量

和真实的场景刻画了在保卫祖国的过程中英勇服役的士兵、水兵和军官的形象,详细描写了战争场面及爱国主义精神,以现实主义描写手法从整体上对战争进行了解读,流血、痛苦和死亡贯穿了战争的整个历程。对于作家托尔斯泰来说,克里米亚作为俄罗斯土地紧紧与祖国联系在一起。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经历为其未来创作《战争与和平》提供了真实丰富的素材。在克里米亚各地留下最多足迹的要数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А. П. Чехов),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五年,并完成许多作品的写作,包括短篇小说《На святках》(《圣诞节》)、《Дама с собачкой》(《带狗的女人》)、《Архиерей》(《主教》)、《Невестка》(《儿媳》)、中篇小说《В овраге》(《在峡谷》)及剧本《Три сестры》(《三姐妹》)、《Вишневый сад》(《樱桃园》)等。在距离雅尔塔不远的地方契诃夫买地建造了一座白色别墅,与母亲及妹妹一起搬至这里,白色别墅的生活成为契诃夫与知名作家及克里米亚之间的联系纽带,围绕着作家克里米亚的家园形成了艺术创作与思想碰撞的自由氛围。在白色别墅的客厅里契诃夫曾经接待过作家蒲宁(И. А. Бунин)、卡拉连柯(В. Г. Короленко)、库普林(А. И. Куприн)、高尔基(А. М. Горький)、巴尔蒙特(К. Д. Бальмонт)及画家瓦兹涅佐夫(В. М. Васнецов)和列维坦(К. М. Левитан)等。契诃夫在克里米亚的文学创作活动达到作家自身的最高境界,纯净、美好、安宁、舒适的环境为作家思考人生和创作提供了前提条件,“真爱”与“救赎”、“告别旧生活”与“开创新生活”成为作家生命最后时光里的主要创作主题。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因为契诃夫而更加名声大噪。克里米亚在近百年历程中与俄罗斯作家、诗人及画家不断对话与互动,形成了克里米亚所特有的文化。克里米亚文化渗透着俄罗斯文化名人的思想,是俄罗斯文化和民族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认为,这一条脉络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的内涵非常丰富,形成了丰富的文化观念域。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的内容与到访过克里米亚的作家和艺术家的名字、文学和艺术作品、作家及艺术家在克里米亚的艺术足迹等密切相关,是洋溢着“异域风情”和“文化遗迹”的疗养胜地。从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将克里米亚半岛划分给当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以后,克里米亚半岛成为苏联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共同的度假休养胜地。俄语国家语料库的资料显示,在现代俄语中语言意识形象“Крым”与“度假”、“休养”、“治疗”等概念相连,继承了19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艺术名人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想象和追求,淡化了克里米亚在政治地理中的战略作用。

#### 4. 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在普京国情咨文中的复活、重建与创造

2014年12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国情咨文。在国情咨文的开篇普京用较大篇幅阐释俄罗斯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认识及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原因,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的历史内涵在总统的政治话语中得以复活、重建与创造。

首先,普京总统利用国情咨文作为政治文本的权威性,继承了“克里米亚”这一语言意识形象所蕴含的俄罗斯民族宗教精神本源,实现了语言意识形象的复活。普京总统鲜明地提出“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нашего народа это событие имеет особое значение. Потому что в Крыму живут наши люди и сама территория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 важна, потому что именно здесь находится духовный исток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ноголикой, но монолитной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 и

централизованного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едь именно здесь в Крыму в древнем Херсонесе, или как называли его русские летописцы Корсуни принял крещение князь Владимир и затем и крестил всю Русь”(“对于我们国家和我们的人民来说,克里米亚的回归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克里米亚半岛上居住的是我们自己人。克里米亚领土从战略上说是重要的,因为正是克里米亚是团结多样的俄罗斯民族及中央集权制俄罗斯国家形成的精神起源地。正是在这里,在克里米亚古老的赫尔松内,也就是俄罗斯历史学家提及的卡尔苏尼,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洗礼,接下来整个罗斯受洗”)。普京总统详实地提及了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洗礼的具体地点,回忆了俄罗斯接受东正教的历史过程,并把克里米亚作为俄罗斯接受东正教的起源地与统一多民族中央集权制国家的精神起源联系在一起。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将克里米亚看成是俄罗斯民族和国家形成的精神起源地,是再一次向自己的国民及全世界宣传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的本源,也为克里米亚归属俄罗斯寻找历史和文化的依据。为罗斯国家及子民选定精神信仰的弗拉基米尔大公正是在克里米亚的赫尔松内实现本人的洗礼之后,于988年实现了罗斯国家的洗礼。罗斯受洗标志着信仰多神教的罗斯大地从此皈依东正教。弗拉基米尔大公本人接受洗礼的赫尔松内位于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全民族认同的神圣之地。对于俄罗斯来说,没有克里米亚的赫尔松内,就没有弗拉基米尔大公和俄罗斯人接受东正教的洗礼,也就没有了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起源,从而也就没有了发展千年独具特色的俄罗斯文化。受洗之后的俄罗斯很快受到保加利亚等周边国家的影响,出现了传播东正教所用的语言和书面语,逐渐形成教会斯拉夫语与古俄语并存的局面。掌握教会斯拉夫语是当时受教育者的象征,教会斯拉夫语是记录和保存崇高词汇和俄罗斯精神性存在的语言。克里米亚对俄罗斯民族来说就是俄罗斯的遗产和历史,克里米亚是俄罗斯民族道德价值观的起源地,因此俄罗斯不能没有克里米亚,没有克里米亚俄罗斯就丧失了精神和灵魂。这样的认知为普京在外交中决定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提供了文化基因基础。因此在普京眼中,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首先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源头。普京总统利用国情咨文和领袖人物的权威为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圣地进行了有力的说明和辩护。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的远古记忆在国情咨文中通过总统的演说重新获得生命,获得俄罗斯全体国民的重新记忆和联想。与克里米亚相连的地名、人名和历史事件在总统国情咨文中重现“Херсонес”(赫尔松内)、“Корсуни”(卡尔苏尼)、“крещение князя Владимира”(弗拉基米尔大公受洗)、“крещение всей Руси”(整个罗斯受洗)等再次成为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的核心标志。

其次,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进一步阐释了克里米亚对于建设团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重要意义,该观点与普京总统对外坚持“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国家理念相契合,“克里米亚”作为语言意识形象的内涵得到重塑和创造。在国情咨文中我们看到,总统坚持的“团结一致”、“俄罗斯民族”、“中央集权制”和“俄罗斯国家”、“精神起源地”这五个概念反映了国家理念的内容,赋予作为语言意识形象的“克里米亚”崭新内涵。作为政治话语和政治文本的国情咨文中总统有这样的表达: Наряду с этнической близостью, языком, общими элементам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й культуры, общей, хотя и не очерченной тогда устойчивыми границам и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нарождающейся совместной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и



властью князя, христианство явилось мощной духовной объединяющей силой, которая позволила включить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единой русской нации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обще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самые разные по крови племена и племенные союзы всего обширного восточнославянского мира. И именно на этой духовной почве наши предки впервые и навсегда осознали себя единым народом. И это даёт нам все основания сказать, что для России Крым, древняя Корсунь, Херсонес, Севастополь имеют огромное цивилизационное и сакраль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ак же, как Храмовая гора в Иерусалиме для тех, кто исповедует ислам или иудаизм. Именно так мы и будем к этому относиться отныне и навсегда. (“民族特征的相近性、共同的语言和物质文化的相近因素、受制于大公经济活动和权力所形成的共同领土,使得基督教很快成为强大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促使东斯拉夫世界的部落及部落联盟加入到俄罗斯统一民族的形成和共同国家的形成中。在这样的精神土壤中我们的祖先第一次也是永久地意识到彼此是统一的民族。这足以让我们有充分的依据认为,克里米亚、卡尔苏尼、赫尔松内和塞瓦斯托波尔对于俄罗斯而言,就像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对于伊斯兰信徒和犹太信徒一样,具有重要的文明与神圣意义。从现在起直至永远我们都会这么认为。”)我们认为,这段表述充分体现了普京总统建构的“权威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国家理念三大基本特征,既是对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俄罗斯民族传统文化的尊重与回归。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与民族传统文化密不可分,传统文化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东正教文化思想,克里米亚的回归是对民族精神源头的追溯。正如学者刘莹认为,东正教精神文化中的政权至上、君权神授、聚和性、末世论及救世主义思想,以及村社生活和君主专制遗留下的社会政治影响,都是形成权威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政治文化的历史原因(刘莹,2014:162)。东正教传统中的弥赛亚思想同样能够在当代俄罗斯帮助统治者树立国家理念的终极目标,即恢复和实现俄罗斯民族国家的强盛和世界影响力。普京执政以来,一直注重寻找作为国家元首领导俄罗斯人民建设一个强大俄罗斯的内在精神动力,这个精神动力就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东正教价值观。从历史上看,沙皇时代的国家政治与东正教会紧密的联系互动使得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一直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执政者的国家理念也参杂了东正教的精神追求。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国家政治沿袭了政治历史传统,把东正教价值重新置于统领国家和民族精神追求的地位。作为国家元首,普京始终坚持认为,俄罗斯近二十年出现的重读历史、文化寻根等向民族传统回归的趋势是个可喜的现象,俄罗斯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振兴要靠俄罗斯人民特有的东正教聚和精神、文化传统和共同的历史记忆来加强。因此,在执政过程中,坚持弘扬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统一并通过汲取千年来形成的文化精神来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是总统国家理念的核心和神圣使命。国情咨文作为政治文本丰富了现代俄语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的内涵,“Крым”(克里米亚)、“Древняя Корсунь”(古老的卡尔苏尼)、“Херсонес”(赫尔松内)、“Севастополь”(塞瓦斯托波尔)等地名与“духовная объединяющая сила”(统一的精神力量)、“единая русская нация”(统一俄罗斯民族)、“единый народ”(统一民族)等内涵相连,语言意识形象在内涵复活的基础上得到重塑。

第三,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俄罗斯民族的自我认同,赋予克里米亚俄罗

斯民族本源意义: 克里米亚是俄罗斯民族自我认同不可或缺的因素。俄罗斯历史上经历了从原始种族、血缘认同到以东正教为基础的文化认同, 再到以专制制度和中央集权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认同, 通过不断的自我认识、否定和再认识, 逐渐将宗教文化和专制制度作为认识自己和区别他民族的标准(刘莹 2014: 192)。在俄罗斯民族追求民族与国家认同的过程中, 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性是首要标准和原则, 这也是国家政权不可撼动的写照。正如卡拉加诺夫的评价: “俄罗斯急需的是改变自身与国家建立一种精神上的联系, 应该在消除头脑中的‘混沌’和相互残杀的不满情绪, 相信未来, 找出自身的民族认同, 这种民族认同必须建立在对自身的正确评价基础之上和对民族本源的正确认识之上”(Караганов 2013)。普京在国情咨文中的表述通过对克里米亚的定义强调其做为俄罗斯民族和国家认同中的不可或缺因素。“克里米亚”语言意识形象崭新的内涵与我们以历史视角描写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视察俄国南方的目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由此也看到了政治先例情景对普京处理克里米亚问题的影响, 克里米亚半岛由此再次承担历史重任, 成为统一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象征, 成为俄罗斯民族对内自我认同和对外国家认同的标志。该语言意识形象的内容与历史视角形成历史文本的互文, 将影响俄罗斯人对克里米亚半岛的认知并推动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内涵的变化。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 我们看到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的内部深层次政治文化因素及通过国情咨文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内涵如何复活、重塑和创造。

### 5. 结语

普京国情咨文发表半年之际, 我们在 60 名俄罗斯留学生中对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进行了联想实验, 要求俄罗斯留学生写出出现在他们头脑中与“Крым”(“克里米亚”)一词相关联的 10 个联想词汇。实验数据表明, 排在最前面的词汇有: Море (大海) (33 5.5%)、Россия (俄罗斯) (30 5%)、Полуостров (半岛) (25 4.2%)、Отдых (休息) (22 3.7%)、Курорт (休养地) (21 3.5%)、флот (舰队) (18 3%)、Украина (乌克兰) (18 3%)、Севастополь (塞瓦斯托波尔) (15 2.5%)、Лето (夏天) (14 2.3%)、Артек (阿尔焦克) (13 2.2%)、Пляж (海滩) (12 2%)、Солнце (太阳) (11 1.8%)、Путин (普京) (11 1.8%)、Черное море (黑海) (10 1.7%) (括号中的数字表示该词被受访者提及的次数, 后面是占总次数的百分比)。实验结果证明, 普京总统对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这一历史事件的阐释, 实现了对语言意识形象“克里米亚”内涵的重新塑造, 并对俄罗斯人的认知产生一定影响。与俄罗斯语料库中与“Крым”(克里米亚)一词搭配进行对比, 在语料库中前 200 个句子中, 96% 的例子与“отдых”(休息)、“курорт”(休养地)、“отдыхать”(休息)等词汇相关。“克里米亚”在当代俄罗斯人传统意识中大多与度假胜地有关。而在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之后, 与之发生的联想关系发生改变。“Россия”(俄罗斯)、“полуостров”(半岛)、“флот”(海军)、“Украина”(乌克兰)、“Севастополь”(塞瓦斯托波尔)、“Путин”(普京)、“Черное море”(黑海)等与国家、地理概念及领导人相关的联想明显增加, 占受测联想总反应词汇的 21.2%。我们看到国情咨文作为普京总统对内向国民对外向其他国家阐释自己国家理念和外交政策及行为的政治文本作用, 同时也体会到了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政治交际中语言代表的权力和

国家意志对语言意识形象建构与重塑产生的影响。毋庸置疑,普京此番话语逻辑对凝聚俄罗斯国内共识,提高俄罗斯相关行为合理性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也应注意到这种基于宗教、历史、文化的“民族记忆”与俄周边各国的主权国家“边境”概念认知易导致摩擦,由此造成的复杂影响还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 [1] Караганов С. А. Зачем нуж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 [OL]. [https://ria.ru/valdaiclub\\_anniversary\\_comment/20130819/957213227.html](https://ria.ru/valdaiclub_anniversary_comment/20130819/957213227.html)
- [2] Тарасов Е. Ф.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е общение—новая онтология анализа языков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А]. Уфимцева Н. В. Этнокультурная специфика языкового сознания [С]. М.: ИЯ РАН, 1996.
- [3] Тарасов Е. Ф.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анализа языкового сознания [А]. Уфимцева Н. В. Языковое сознание и образ мира [С]. М.: ИЯ РАН, 2000.
- [4] 崔璐. 2014. 俄罗斯文学中的“克里米亚”形象 [J]. 俄语学习, (5): 11—15.
- [5] 费尔南·布罗代尔. 2014. 文明史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 [6] 刘显忠. 2014. 克里米亚半岛的历史变迁 [J].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 95—100.
- [7] 刘莹. 2014. 普京的国家理念与俄罗斯转型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8] 丘季诺夫·阿·普. 2012. 杨可 郭利 胡荣哲译. 现代政治语言学 [M]. 海口: 南方出版社.
- [9] 孙吉胜. 2007. 国际关系的语言转向与建构主义理论发展研究: 以语言游戏为例 [J]. 外交评论, (1): 37—45.
- [10] 孙玉华 彭文钊 刘宏. 2015. 语言的政治 vs. 政治的语言——政治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 1—7.
- [11] 杨正. 2015. 作为历史文化现象的“波将金村” [J]. 中国俄语教学, (1): 70—74.

**A Political Linguistic Study of “Crimea” as the Language Consciousness Imag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utin’s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p. 1. *Sun Yuhua Liu Hong & Peng Wenzhao*

Language consciousness image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issue which arouses the concern of psycholinguistics, linguistic culturology and some other discipline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linguistics, the studie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tical text and national language consciousness image have come to the fore. “Crimea” as a Russian language consciousness image bears a new connotation after going through three developing stages in histor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Russian President Putin’s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in 2014, we find that the political discourse of a country’s leader rebuilds “Crimea” as a language consciousness image. Crimea becomes the spiritual origin of the diversified and united Russia as a nation and as a state with centralized system. The language consciousness image “Crimea” defined in Putin’s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 will influence Russians’ understanding of Crimea. The contemporary Russian political text influenc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language consciousness image of a nation, because there exists a covariant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al text and language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political linguistics; political text; language consciousness image; Crimea

**A Pragmatic Analysis of Evidentiality for Media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Crisis Context** p. 12. *Ran Yongping & Yang Na*

Taking a subjective perspective of evidentiality to examine media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risi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pistemic stances of evidential forms and the related linguistic practices. It also analyzes the motivations and pragmatic principles for conducting linguistic regulations by using the “Rapport-management Model” proposed by Spencer-Oatey. It is argued that the evidential forms are not necessarily correspondent with the practical sources of information, but spokesmen can better manag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through strategic controls of evidential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teractive purposes in the context of crisis and the interpersonal pragmatic principles.

Key Words: press conference; context of crisis; evidentiality; stance; rapport-management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Social Ideal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A Study on Articles Collected in Two Journal Databases of Late Qing and Republic Era** p. 22. *Huang Min*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Late Qing Dynasty Periodical Full-Text Database* and the *Republican Era Periodical Full-Text Database*, and taking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this article carries out a discourse analysis on the more representative “social ideals” of modern China,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those of then and the current China Dream and discussing related issues. The study has found there are shared as well as unrelated ideals, with their common ground indicating that the “prosperity of the nation”,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and the “people’s wellbeing” as both the dream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dream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e historical connotation and national sentiments of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at its core constitutes not only the basis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in modern China, but also a strong power for the national identity today. However, the difference also indicates that “the rejuvenation of the nation” has a strong epochal nature; therefore, attentively observing the people’s requirement of the times, promptly responding to and adopting effective actions become important tasks faced by the leadership.

Key Words: China Dream; social ideal;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Grounded Theory